

吉拉特快讯

【那年那月】

恢复高考的1977年,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挨饿。由于我数理化学得好,在当地小有名气,本村一个比我低两届的女同学也在复习备考,她父亲就叫到她家和我一起复习。她家光线稍好点,我和她共同复习的四十多天里,她妈妈每晚给我和她做一顿猪肉菜。

从得到恢复高考的准确消息,到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日期(1977年12月13日)仅剩不足六十个日夜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考试课程都复习一遍,实非易事,况且那时也不像现在有统一的教材和复习大纲。尤其是政治,我上高中时,学的都是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真不知道怎样准备。好在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估计,再加上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非常赞同,我猜想政治试题出得不会太高深,因此,干脆就不准备政治。又因我平时爱写点东西,所以语文也不用怎么复习。这样一来,我便利用空闲时间里集中精力整日钻研理化。

为了一道数学难题,我曾大清早起身,骑自行车去百里以外的萨拉齐中学请教过老师。返回的时候,为解决一道正在思考的解析几何题,我几上几下自行车。有一次,因边骑边想骑到了路基下,摔倒了,灵感也同时而至,我也顾不上,就势在雪地上用树枝算起来。解答出来后,我的手已经冻僵了,不得不使劲搓了又搓,跨上车上剩下的三十多里路。

我准备考大学的那个冬天,连村里的老人,不管是谁有点文化的,还是一字不识的,见面、串门时说的也是关于高考的话题。不是你问我,我问我,就是她问我,我问她。高考成了人们共同的语言,我们就被包围在这种浓浓的备考气氛中。那时,我没有钟表,我

我看的新闻,只有黑白的区别。为了不影响家人睡觉,我用拆开的纸箱板在家地下面给自己围了一间书房,有时,鸡鸣叫过两、三遍了,我还在复习。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我在油烟黑度和时间参数的启发下,理解了数学中的正比例函数关系。有时,我还解不开的正题带到梦里。说来也巧,我曾在梦中解决了一道化学计算题,醒来后,赶紧把它落实到纸上。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到公社中学问在那里代课的老“老三届”高中生。证实之后,我好像变得聪明了,以后的复习,也就顺理得多了。

报志愿时,由于受“农业学大寨”的影响,我想全国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还会有挨饿的人吗?所以,就填报了一些和农业有关的院校。

春节之后,我突然收到了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该院前身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记得,我们上默特右旗双龙公社当年参加高考的人不下二三百,既有当地应届高中生,也有到我们这儿下乡的天津、包头等大城市知识青年。结果,我们公社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而我则是第一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年的高考程序是报名、考试、体检、录取。考试结束约二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公社广播站突然广播说要有重要通知。通知说请下列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旗医院接受高考体检,我的名字被首先念到。后来我也参加了,那就表明我上线了,因为,也有参加过体检而没有被高校录取的人。那年并没有向学校公布成绩,也没有向考生明确宣布过录取分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当年考了多少分,而且当时也没有重点和非重点大学之分,我是在入学的路途上,从火车上的广播里知道自



□ 贾振声

己上的一所重点大学。

刚到那台,看到大街上包白羊肚毛巾的老乡赶着驴马车,还以为《地道战》《地雷战》里的老乡又出来活动了。解放都二十来年了,这内地怎么比我们塞外还土还落后呢?到校后,看到我们的教室、宿舍、食堂都非常简陋。尤其是食堂,只有厨房,没有饭厅,吃的是一份份,大家排着队打饭,打完就蹲在檐下吃。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开水供应开放,只在开饭时,食堂外放有几个盛开水的木大桶。

那时,正好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刚发表,大家都以陈景润为榜样。我们不知道对饮食的饥渴,只知道对知识的饥渴。高水深等十多个同学学习累得得了肺炎,但没有一个去就医。那时,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我们仍住在一起。病倒也没有传染上,学习精神倒传染给了其他同学。我的上铺李彦东早出晚归,陈丁丁边走边背英语单词,张笑理坐在那里死熬一道题。那时人人不睡下,被问倒的同学,也个个海人不

倦。恢复高考当年,报考资格全国是一样的,除了老三届,其他人都限制在二十五周岁,未婚。各省单独命题和组织考试,考试时间也不统一,考后也没有公布分数。正像陈丁丁在微信里说的,他至今也不知道当年考了多少分,我也一样不知道。那时,也没有高考状元这个说法。我相信学校是知道大家考了多少分的,但也一直没有透露,或许是顾及我们的颜面吧。

我上大学之前,除了参加高考到过县城,就一直没离开过我们村,还以为全中国都和农村一样的。一下子离开家乡几千里,才发现“环球同此凉热”不过是一句诗而已。那台的夏天比我家乡的夏天要热很多,我倒是上“敬教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诗句鼓舞得热血高涨,可我没本事把那台的夏天弄得凉快点。

当时,书店里架架的位置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籍。我们有的课程教材都没有,英语教材是曹老师印的。英汉辞典更是稀缺,一听说

新华书店有新书了,大家都早早地去抢购。渐渐地,亚瑟·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出现了,那些人多会外语啊,我没有在意。因我中学时有过学英语,又没有英汉辞典,课余时间就去阅览室抄英汉辞典(因为工具书不外借)。那时其它书都可外借,且是架架的,即读者到书架上自己找。我看到曾经被定为毒害的书或再版或重印了,还有好多外国文学名著。我三天就去借一本,从此,结识了雨果、巴尔扎克、哥德、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托尔斯泰、钱锺书、巴金等。这些再版或重印的书,谓之重放的鲜花。由此我认识到,政策或形势一变,毒草就变鲜花了。我爱看报,一张报纸,大家抢着看。大家关心政治,倒不一定是热衷政治,因为谁也离不开政治。

1978年端午节前,我们后半夜起床去农去帮生产队割麦子。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四届人大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五届人大就把开了,收割方式沿用的是老祖宗发明的,即用人用镰刀收割的方式,这跟这个学农机的水平,不过我自己理解我才刚入学。

我入学时,大哥告诉我北京怎样中举。可火车停在了永定门,那时,我不知道永定门也是北京的。

还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政治经济学考试时,监考老师看同学们东张西望,就抽抽眼睛的同学就把他,可没有一个人抽的。老师的开放,同学的自觉所形成的那种和诣的氛围让我至今难忘。还有材料力学考试,本来两节课的时间,结果延长到四节课也没有人交卷。这要是现在,那就是教学事故了。那时,我们都自资自己没有学好,没有人怨老师没有教好。辅导我们作业的是一位李庆林老师,他没教过我任何一门课,只听这个名子,我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但我无端就对他有好感。所谓设计就是画图,我制图最差,纸上谈兵我也谈不好。记得李老师说哪里画错了,也就按一下指点,我就对李老师的好感倍增。我知道我是唯心的,因为哲学老师讲给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根本没进我的头脑。

学校迁回北京后,因校舍被好多单位占用着,我们二十多个男生就住在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大房间里。一到晚上,打鼾的,说梦话的,磨牙的此起彼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光棍班呢。其实,我们既有六个女生呢,这在当时算不少的。不知是我们不开放还是顾不上,反正没有见过男生有近距离接触的。我记得,我就没有和哪个女生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哪个女生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时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不知道谁能歌舞。在那台时,河北省三建在搞施工,广播里每天播放评剧《刘巧儿》。我们师生不知是开不开,还是没有她们中意的赵振华。总之,没有一个女生像刘巧儿的。

北京的外文书店还卖影印的外文书,我就在工道口的书店里买《Interesting Things》(The Garden Party)。同学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诗人赵恒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描绘了当时人们的学习热情,诗中写的就是完充五六天产假的纺织女工推着婴儿车上班,她叮嘱自己:“别忘了中午三十分吃午饭,挤出十分钟跑趟邮电亭,续订下一季度的《英语学习》。”这是我在1981年9月21日早晨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记下的。工人如此,可见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了。大家想的是如何振兴中华,没有人想如何挣钱当官。那种学习热情和追求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童年印记】

我的“六一”儿童节

□ 林金栋



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虽然我没有花园,但有潮湿山野的野花,有草,但有倔强生长的野草;没有美丽的衣裳,但母亲会把哥哥哥哥顶给的那个白色老布衫和那件黄色条的领巾浆洗得干干净净。

大喇叭反复播放着为数不多但很是欢快的歌曲,因为无需上课,大家就不用背书包。即使背书包也是戴着家里给他们准备的诸如鸡蛋、炒豆、油炸之类的零食,不背书包的,就直接揣在衣服的口袋里,有馋嘴的在路上就抠挠的所剩无几了。同学们似乎平时来得更早,自发几个组成一组尽情地玩着前角、摸拍球、骑马、跳格格、翻翻格、滚大绳等久玩不厌的游戏。只待少先大队辅导员喇叭一通知各班集合时,伙们按照前几天演练好的队形迅速排队成行。这时早已汗流满面,满身泥土,红领巾也歪在一边了,班主任老师晚天荒地没有批评,指挥着大家整理行头,强调几点注意事项之后,便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老师

孩子习惯得摔了,爬惯了山路,个个都是运动健将,特别是脱掉棉裤在身上冬一春的棉袄棉裤,一身轻松,如逃出五行山的孙悟空。而我因为先天不足,个子小,骨头软、罗圈腿,只能做些拉绳、插秧等轻快的活。

那时,学校没有小卖部,也没有来客买吃的,为了去食堂盛水的池子里舀点凉水咕咕灌饱,一饮而尽。后来,有从树林召坐班车来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根。我便凑在父亲身边,倘若他老人家心情好,会赏赐我几颗姊妹几个每人一支,但就此打住,只有再一,没有再二三。用舌头舔一舔,那个冰凉、那个甜,在夏日里吃到这等食物,那是多大的享受啊,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有时也会有文艺表演,雄壮的革命歌曲此起彼伏。一次,我和同学社文商排了一个诗朗诵《雷锋之歌》,两个人的脸蛋被红纸糊得通红,眉毛用墨画得黑黑黑,打扮得像个女英雄的。一口标准的台外普通话,说着说着忘了角色,小眼睛一眯,逗得台下的人哈哈大笑。

活动结束了,回到家里,该干啥干啥,背一根绳子,提一个箩筐,漫山遍野掏野菜、挖羊茅,再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劳动节”。

我的六一儿童节,永远刻在脑海里,忘记不了。今天作为礼物,讲给我的儿子,讲给现在糖水水泡大的小朋友们。

【时光煮雨】

童年的路

□ 小花园



山路弯弯曲曲,才下沟又上坡。一寸宽的小道,常常连着直立的崖,不敢向下看。

罐头瓶里带了水,我和她端着水雨下天烙饼。我问什么时候到老山沟,山梁的褶皱就扑进她的眼里,加深着她眼角的纹路。

下了坡,我们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蹚水过河。春天的冰水融化不过,河水依然冰凉。我什么时候到老山沟,波就划一圈一圈荡开,给姥姥一个踉跄。

老山沟的路,是姥姥回娘家路,也是我童年的第一次远行。

山路那么长,长得看不到尽头。但我可以跟在大人

身后,可以任性地歌唱,可以一遍一遍问什么时候到达,而大人无言可问。

行路多艰,小孩不知远近,也不知这就是日后必经之路,别无其他,只觉得累,就是童年的可贵。

这样的远行毕竟是少数。而上学,却是日复一日的远行。

上学路没有山梁,却是漫漫沙海。要吃下许多沙子,要深一脚浅一脚许多次,会把泡沫鞋底磨穿穿帮。

上学路上,我希望我是骆驼,生命力顽强的骆驼。我们一日行十里,沙子很多,但路就在脚下。童年时还走过许多路,有陪姥姥下

的野花,照出星星点点的浩瀚夜色。

童年的路,那路上的风沙、河流、山梁,都覆盖了生活的相象。

童年,让我走出老山沟,撞进新世界。后来我们海阔天空,历山河。后来,童年的路一直生长,直到现在,并通往未来。

【清浅时光】

端午情思

□ 梁艳

与现在的端午节相比,总觉得孩提时的端午节过得更有滋味,因为有一份期待在里面。

在那个吃食并不丰富的年代,作为孩子的我们盼着节日的到来。大人们平常都会一分钱掰成两份用。只有在节日里才能肆意享受那份丰盛和欢乐。端午节是盛夏的一个节气,我很喜欢夏天的,也很喜欢端午节的粽子。可是,对于家人来说,对于包子是并不擅长的,他们更拿手的是凉糕。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凉糕是北方地区的习俗,尤其是老年人也很爱蒸凉糕。在凉糕时,还不忘往锅里煮几个鸡蛋,说是能去百病。每逢端午节的前两天,母亲就开始准

备了,把江米提前用酸浆浆好,到初五这天做成凉糕。凉糕做高筒,待凉了的糯米发粘,用大火蒸熟了,摊开切成2.3寸的方块,撒白糖、青丝、红丝、葡萄干和红枣等辅料加以点缀,“凉糕”便做好了。光是看起来就已经很有食欲了,吃起来更是沙而不腻、糯软不粘牙,所以一小心就会吃两口。常常开玩笑说:“端午好过,端午难过”,说的就是贪吃凉糕的缘故。

“凉糕”顾名思义是放凉了吃的,无论蘸着白糖还是红糖吃都是很好吃的。只是与粽子相比,它少了一份醇厚的香气,没啥想,孩提时我对这个粽香情有独钟的。于是父亲便学习了包粽子的手法,并在一个端午节第

一次尝试就成功了。包好的粽子个个呈三角锥状,线捆得紧紧的,模样那叫一个周正,煮好了也没有漏米,和姥姥第一次吃了好几个。

时光的刀,快得没有理由,一年一年,一月一月,流年辗转,父母已渐老矣,但那份无私的爱,一直伴着我,心温温热热。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无论是粽子还是凉糕,包的都是父母对我们浓浓的爱。

如今的端午,有些许忙碌,可生活需要仪式感,在节日的氛围里,亲情的脉络,才愈加清晰。又是一年端午节来临,我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要趁这个端午节,写出一篇文章来,让心灵化入文中,作一场情感之旅。